新闻热线：010—58884050
E-mail：changetougao@163.com
科技日报
■责编 杨 雪
2015年6月27日 星期六

■玉渊杂谭

高考状元：应以理性待之

文·杨 雪

随着高考分数相继出炉，各地高考状元依次“亮相”。对于各类文、理、县、市、省状元，目前社会上普遍呈现出两种态度：一种看中高考状元的符号效益，例如家长的训导语录里又能多出若干个“别人家的孩子”，各大名校招办也开始挖空心思“抢状元”。这不，为争夺今年的重庆文科状元，堪称“国内双雄”的清华和北大彼此险些剑拔弩张。

另一种态度则显得有些麻木，甚至对那些辉煌闯过人生第一道大关的学子们嗤之以鼻。有人给出两份名单，第一份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是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而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当然，单纯以此宽慰考生和家长并无不妥，但如果上升为“状元无用论”就不可取。毕竟，状元及第是宝塔尖，从概率学角度看，必然不会比人口基数庞大的落第考生队伍的成材率高。

过来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少时一直认为高考乃是此生痛苦学业的终极了结，却在多年后回看时发现高考只不过是人生奋斗苦海的起点，实在微不足道。对此也有一个嘲讽的段子，比喻得倒也贴切：其实文凭不过是一张火车票，清华的软卧，本科的硬卧，专科的硬座，民办的站票，成教的在厕所挤着。火车到站，都下车找工作，才发现老板并不太关心你是怎么来的，只关心你会干什么。想起比尔盖茨的话，难道坐头等舱会比坐经济舱先到达目的地吗？

现行高考制度固然有其顽疾，但社会对待高考的态度却有可商量的余地。过分贬谪高考状元，非要拿极端个案说事，恐怕有点“狐狸说葡萄酸”；过分注重并放大高考状元的符号效应，则显得愚昧。念在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也就罢了，然而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两所学府，此番派专车“抢状元”实在抢得有失风范。古时也有人“抢状元”，那时的天子门生当然没有学府来抢，来的大多是达官显贵派来说亲的大痣媒婆，恨嫁的大多是势利刁蛮还可能并不美貌的千金小姐。古今观照，本应独立治学的高等学府置自己于何地？

■桂下漫笔

她们为什么不嫁人

文·胡一峰

“剩女”，是近几年才兴起的词儿，但“剩女”现象却早已有之。19世纪，广东就有“自梳女”，她们掌握养蚕缫丝技术，经济独立、自给自足，无需仰男子鼻息生活，相约不嫁，聚居在“自梳屋”中。即便有的“自梳女”迫于家庭逼婚压力或社会舆论而出嫁，也不与丈夫同住，仍和姊妹为伴，称为“不落家”，大概为不将自我失落于夫家之意。清末民初，自梳女在广东成一庞大群体，有的地方一个县就有数千人之多。

进入20世纪，中国传统伦理纲常进一步瓦解，个性解放、思想多元的文化氛围愈发浓厚，“独身主义”思潮悄然兴起，“剩女”现象更为明显。和今天一样，成为“剩女”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吃过婚恋苦头而大彻大悟，有的心比天高却高不成低不就，有的一心事业心无旁骛，有的红颜薄命所托非人而青春蹉跎，还有的受困于家庭门第有情人难成眷属。其中，有一些主动把自己“剩下”的“独身主义”者，各种“不嫁会”也应运而生。

1916年底，南京有富二代美少女15人，组织了一个“不嫁会”，会规规定入会者宣誓终身不嫁，而且鼓励会员素面朝天，禁止各种妖艳之态。1917年，江阴也出现了类似组织，名为“立志不嫁会”，该组织特别注重宣传自己的主张，对成员也施行严格管理。会中规定：“凡会员均有劝人立志不嫁之义务，且有保守本会不使泄露秘密机关之责任”。“既入会，当不参预人之婚姻事。若私与男生往来，经觉察后，立除其名。”1919年，上海又成立了一个“不婚俱乐部”。据《大公报》的报道：江苏南通人蒋某，中学毕业后到上海执教，发起“女子不婚俱乐部”，“入部年龄资格定章20岁起到40岁止，每年公缴部费6元，得享有部中权利。”这个组织程序严格，入会需有老会员介绍，而且要填写入会志愿书，立下字据“誓不婚嫁，如有故违愿，甘罚洋600元”。据估算，在当时的上海，6块钱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元，应该说这笔入会费并不算少，想来入会者应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1928年金陵女子大学对10年来毕业女生之婚姻状况做过一次统计，结婚的只有16%。这些都表明，和19世纪的“自梳女”多为乡间劳动妇女不同，20世纪的立志不嫁者多为受过较高现代教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城市女性。

除了以独身为宗旨的社团外，当时一些人们熟知的社团，也把独身作为一条“帮规”。比如，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很多是独身主义者，青年毛泽东就曾和蔡畅、蔡和森约定：永不结婚。同样，天津的觉悟社也要求成员在学生运动期间，专心于革命事业，不恋爱、不结婚。周恩来还写文章宣传过独身主义。当然，觉悟社和新民学会的绝大部分独身主义者们后来都结了婚。周恩来1925年和同为觉悟社成员的邓颖超喜结连理，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厮守终身，成就了一段爱情神话。觉悟社还有一位张若名，也曾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矢志积极追求女性的独立与解放。她认为，女子不应把婚姻看得太重，“女子解放”重要的问题，还在知识供给，经济独立……方面。有了充分的知识，独立生活的能力……婚姻问题不解自解了“，”女子解放从女子作起，不要等旁人解放“。而要成为女子解放”急先锋“的人，必须抱定独身主义。但张若名后来也还是结了婚。1930年，留学法国的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婚，次年，夫妻双双回国，被誉为”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若在今天，估计很可能被标题党冠以”人生赢家“之名传遍朋友圈。

当然，也有坚守独身理念而终身不嫁的。比如，新民学会会员陶斯咏、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等都是一心从事教育事业，一辈子没结婚。曾宝荪说：“如果我结婚，顶多能养十个子女，从事教育事业，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这可谓事业型独身女性代表。还有一些女子则是不肯将就型的典型，中国动物保护主义的先驱吕碧城公开宣称，“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吕碧城在当时也是颇有名气的“女神”，发此豪言壮语，也够雷人的，不知被她点名的那几位“男神”又作何感想。

对于“剩女”现象，当时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有的学者把板子打在女性身上，认为新式女性缺少传统的妇德，倨傲、刚愎、冷酷，而且新女性不够节俭，喜好奢侈的生活，加重男子负担，男子成家后，不但得不到温柔和蔼的宽慰，而且引起许多烦闷。这种说法显然太过偏颇。相比之下，周氏三兄弟的评论要有水准的多。针对拿事业作挡箭牌的“剩女”，周作人说，独身决不是个人发展的捷径，也不是改造社会的良药，成功者的成功与独身并无必然联系。作为前医学专业留学生，鲁迅说的更加严重，他认为独身生活会令人精神上发生变化，容易造成执拗猜疑阴险的不健康心态。这番话虽是针对杨荫榆而发，也有打击面过大之嫌。周建人的看法相对比较平和。他认为，独身是个人自由，他人不必妄加评论。有的人为了事业和学问，不知不觉过了独身生活，还有些人因为经历了婚恋的痛苦而选择独身，这些都无可厚非。以我浅见，相较于鲁迅和周作人对独身者的批评，名气不如两个哥哥大的周建人的看法更符合现代文明下的婚恋观，称得上古今“剩女”知心人。

■随想随录

木兰“停机”

文·丁 辉

带师范生到中学里听课，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天听讲《木兰诗》，讲到第一段“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老师用“木兰停机叹息”概括此段段意。话音未落，课室里已是稀稀落落的笑声。等到老师问“木兰为什么停机”，就有调皮的男生在下面回答“木兰没有交话费”，于是满座哄堂。

老师当然不是故意玩噱头哗众取宠，而况用“停机叹息”概括首段段意，很恰切；“停机”一词且很古雅。关于“停机”最广为人知的故典当是范晔《后汉书·列女传》记乐羊子妻“训夫”事。羊子出外求学，一年即返家，妻问其故，羊子答以“久行怀思”，妻其时正在织布，乃停机“引刀趋机”，接下来羊子妻对羊子说的一番话，由于《乐羊子妻》长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在中国曾孺子能诵：“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又早范晔500多年有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记“孟母教子”事：孟子少时读书，经常因为贪玩分心，其母引刀裂断其织，以此戒之。孟子从此勤学不息，遂成大儒。比韩婴稍后的西汉刘向《列女传》亦载此事，稍有出入，而大抵不差。宋人编就的《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说的就是孟母三迁和断织教子的故事。

后来，“停机”“断织”便一直作为女子贤淑美德的代称而存在于古汉语中。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十二钗正册判词“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一句正以乐羊子妻和孟母喻薛宝钗，赞其贤良淑德。

老实说，我对上述羊子妻“训夫”和孟母“教子”两事都有点不喜欢。羊子妻病在太过正经，有股道学气。有这样的贤妻固是家门之幸，然夫妻生活成了道德旅行，了无生趣，反正我是万万不敢领受。羊子后来一心求学，“七年不返”，空房之内的羊子妻是否也有过“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闺中独语？孟母其实是思想通达之人，小孩子贪贪玩儿走走神，就煞有介事地引刀断织以戒之，我一直怀疑是后人附会唬小孩子用的，和“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等正是一类。此类伎俩几千年来盛行不衰恐正是中国教育的病源之一端。鲁迅说：“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哪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我于刘向《列女传》所记孟母教子诸事中独喜下面这件：

孟子既娶，将入私室，其妇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而求去，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谓之曰：“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所以致敬也；将上堂，声必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恐见人过也。今子不察于礼，而责礼于人，不亦远乎！”孟子谢，遂留其妇。

宋以后儒家的“圣教”逐渐对女人不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三从四德”等等都出来了。此类“教化”道德调门过高而不通情理，清儒戴震所以斥之为“以理杀人”。孟母此言所以好，正在于入情入理，对于“伪道学”真不啻一针解毒剂。可惜无法查证孟母此番话是否也是在“停机”后对孟子言之，否则，“停机”这个典故也将因之少几分道学气，而多几分熨帖人心的力量。

最后，话题还得回到“木兰诗”。《木兰诗》固是质朴的诗篇，“木兰从军”的故事却在千百年流传的过程中难免成为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一部分。“巾帼英雄”的故事自然更能让女性扬眉吐气，以致在欢欣鼓舞中竟绝少有人会去注意此类话语背后的危险。由此，倘不因人废言，一生关注妇女问题的周作人于其《苦茶随笔》中提到花木兰、梁红玉时说的一段话还是值得我们重视：“不过我以为中国要打仗似男子还够用，到不够用时要用女子或亦不得已，但那时中国差不多也就要完了。女军人与殉难的忠臣一样我想都是亡国时期的装饰，有如若干花圈，虽然华丽却是不吉祥的，平常人家总不希望它有。”这些非主流的声音，语文老师即使嘴上可以无，心中却须有。

珍·古道尔的智慧话语

无机客 译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1934-)是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动物保育人士，以她对于黑猩猩的野外研究而闻名于世。以下摘录了她的若干智慧话语。

假如我是一只需要羽毛来飞得更高的小鸟，我的母亲便是我最强健的羽毛。她对我的支持极大。在我一岁半的时候，我从花园里挖出了几条蚯蚓，想让它们和我一起进被窝。母亲十分平静地对我说：“珍，蚯蚓假如离开泥土会死掉。”于是，我俩一起把蚯蚓放回花园里。

★

我四岁半的那年，有次躲进了一间空鸡舍，藏在后面的麦秆堆里，而家人压根不知道我在哪儿……最后，我妈看见一个激动的小女孩浑身上下覆盖着麦秆，向房子跑来。母亲没有冲我发火(否则，那肯定会掐灭掉我的激动)，相反，她望着我闪亮的眼眸，坐下来听我讲述母鸡如何下蛋的故事。

★

有些人说，暴力和战争是无可避免的。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大脑完全能控制本能的行为。不过，我们并不是十分擅长控制，对吧？

★

我度过的最难忘的一天是当我伸出手递水果给黑猩猩“灰胡子大卫”，它却转过了脑袋。当我的手凑得更近些——他接过了水果，丢在地上，轻轻地捏我的手，这是黑猩猩表达安慰的手势……我们用一种比文字更古老的语言进行了完美的交流。

★

有时候，我想做一只黑猩猩……我想要知道，夜晚筑巢是什么滋味，而当你是一只雌性黑猩猩，有一只大个的雄性黑猩猩轰隆隆地向你奔来时，又是什么滋味。

★

我第一次看见成年黑猩猩被关在那些五英尺长、五英尺宽的笼子里的时候，眼泪开始不由自主地涓涓流下来，那只名叫乔乔的黑猩猩伸出纤细的手指，擦走了我的泪水。接着，负责的兽医走了过来。他单膝跪在我身旁，伸手搂住我，说：“我每天都得要面对这种场景。”

★

我想要把整个世界幻想成一副拼图游戏……假如你看着整幅图画，那肯定庞大无朋，令人害怕，但如果你致力于自己的那一小片拼图区域，并且知道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努力完成他们的一小片拼图区域，这种想象会给予你希望。

★

你也许不相信进化，那没关系。我们人类如何进化到如今的模样，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应该现在就行动起来，摆脱掉我们为自己造就的烂摊子。

■艺苑

日落爱琴海(摄影) 行者

■写在书边

鲁迅先生的笑及其他

文·张 涛

晚上台灯下读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读到《鲁迅的笑》一文。毕竟是兄弟，一起长大，一起留日，曾经一起并肩战斗过。即使日后“反目”，也不影响这位弟弟对于其兄长的认识和了解。周作人在文章中说：

鲁迅最是一个敌我分明的人，他对于敌人丝毫不留情，如果是要咬人的叭儿狗，就是落了水，他也还是不客气的要打。他的文字工作差不多一直是战斗，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所以他在这些上面表现出来的，全是他的战斗的愤怒相，有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兕皮的不相同，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贴上一层古代天鹅绒的里子的。他的战斗是自有目的的，这并非单纯的为杀敌而杀敌，实在乃是为了要救护亲人，援助友人，所以那么的奋斗，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是一副十分和气的金面。

鲁迅照片中唯一大笑的镜头，摄于1936年10月8日，十一天后，鲁迅逝世。

而在我对于鲁迅仅有的肤浅认识中，最早的便是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概括，因为在初中、高中的教材上就以此为是的。毛泽东说，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鲁迅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是最有骨气的。在这里鲁迅给人的是一个典型“反帝反封建”的不苟言笑的“硬汉”形象；上了大学，也读了点鲁迅。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连续出版了好几种有关鲁迅与论敌们论战的书。无论各家的目的何在，这多多少少都会让人觉得鲁迅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在“打架”“骂人”的倔老头，而且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士”形象；时间转至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一直被打入“冷宫”的胡适被一些人请了出来，不仅要为胡博士“平反”而且还要追根溯源。他们认为这些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都是鲁迅“大行其道”，所以才把胡适的重要性给“淹没”了。于是一些人便开始“贬鲁扬胡”(其实扬一个，又何必贬另一个呢)，开始在“鲁迅式”和“胡适式”的道路上进行选择(其实人生的路，千万条，为何要拘于一条呢)——“是鲁迅，还是胡适？”。在这样的文化景观中，鲁迅又成了一个坏事、误事的“老愤青”了。

其实无论怎样，在这些人的言论中，或是以鲁迅为之所用，或是与外界随波逐流而随意指摘贬抑。这些人，都不如周作人的见解来得亲切平时，也不如周作人的“平心而论”来得无功利性，因为周作人彼时作文，是无褒贬之心的。

周作人的话，让人想起了鲁迅的笑。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外，其实我们的大先生也时常有爽朗的笑声，正如萧红在那篇著名的《回忆鲁迅先生》开篇说的那样：“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喜欢。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常可见到各色人物的笑：有幸灾乐祸的狞笑，有奴颜婢膝的媚笑，有琢磨不透的冷笑，有不知何故的傻笑，就是难见真心实意的哈哈大笑。在各色的笑声中，呈现的都是一团和气，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白天喝粥，晚上看戏”，其乐融融。“物以稀为贵”，既然笑见得多了，鲁迅先生那副惯有的“愤怒相”就成了宝贝了，就显得可贵多了。所以作家张炜才高呼“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其实人人都知道，这个时代是需要那么点愤怒的。但是人人也知道，在这个时代愤怒是需要代价的，所以人人也不愿愤怒，即使是为自己也不愿。我们都知道的事情，鲁迅又是何尝不知道愤怒的代价呢？我想，其实我们的那位大先生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一副“绅士”派头招人喜欢，尤其是受名流雅士们的青睐。可他却总是与人“不方便”，我看主要还是性情使然，就是图个自己痛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活得“爽”，其中也未必有什么微言大义的。鲁迅先生是个“性情中人”，悲愤时怒骂，快慰时大笑，喜怒皆形于色。

其实，怒也罢，笑也好，只要是出自“真性情”就好。今天的人，活得憋屈，甚至有点可怜，主要不是因为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而是在那儿千方百计地掖着藏着自己的那点“真性情”。这样看来，尽管我们赶上了“新时代”，吃得好了，穿得暖了，其实远没有鲁迅活得潇洒，活得痛快，活得真实。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